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重新研究在 B H S 下面的平常語 (Prakrit) 也是將來的工作之一。季羨林曾經替主張原始佛典以古半摩竭陀語寫成的見解辯護，說這些經典（的語尾）由 -am 變爲 -u，是因爲受到西北印方言（即貝萊 Bailey 所說的犍陀羅語 Gāndhāri）的影響¹¹。但季氏的見解，愛瑞頓和貝凱特，都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參看貝著「法華經馬爾堡革斷簡」Über die "Marburger Fragmente" des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pp. 78 – 79）。愛瑞頓相信..B H S 是植基於某種中古印度流行語的；這種流行語極可能已經是一種方言的混合體。他覺得並無理由對在本質上已經是一個統一的方言的 B H S 在訂正抄本的讀法方面並不成功（參看拙著書評：IIJ, XVI, 1974, pp. 150 – 152）。
（前指書・頁十六）。無疑，據愛瑞頓

面看，都是屬於另一傳統（前引書，頁七六）。無疑，對愛瑞頓所指稱的 **B H S** 典籍，將來從語言、文體方面作更精細的分別，是可能的。布洛就是從語言、文體的特色方面考慮，把它分為九組。但是，兩個理由可能使各類型的 **B H S** 典籍和佛教梵文典籍的中古印度語背景得不到充分的說明。第一，現在我們所能利用的中古印度語資料，如阿育王碑文、及在此之後的碑文並不足夠，而用中古印度語寫成的典籍，在阿育王之後持續了幾個世紀，因此對其早期特徵不能有結論。第二，**B H S** 典籍在寫定之前，已被大量梵文化，因此不可能證明它們最初以中古印度語口述構成時沒有梵文影響的混入。即使像巴利文，當我們校訂巴利文典籍時，問題遠較 **B H S** 典籍為少，但仍不能確定何種中古印度方言或若干種方言對它的形成有過貢獻。若從歷史及語言學的理由上看，西印度可能是巴利文的故鄉，但若從巴利文中具有有名的摩竭陀語素（*Māgadhis*）上看，則巴利文並不僅基於西印度方言。可能，它是在印度的其他地方遭受到中古印度方言的影響之後，流傳到西印度纔形成它的最終形式。

- (1) 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NGGW, 1949, pp. 245–301; Die Umwandlung der Ending-am in-o und-u im Mittelindischen, NGGW, 1949, pp. 245–301; Die Umwandlung des Ending-am in-o und-u im Mittelindischen, NGGW, 1944, pp. 121–144.

布洛的「犍陀羅語法句經」的校訂

雖然在 **B H S** 中有更多的工作須待完成。但對現存唯一的一份用平常語寫成的佛典，亦即約翰·布洛（John Brough）稱之為「犍陀羅法句經」的（London, 1962），却不能如此說。布洛的校訂本包括了所有的斷簡。在他之前的學者，如辛納、呂德斯等，都祇能依據在一八九七和一八九八年出版的若干片斷來研究。它所使用的語言，被稱為西北平常語（Northwestern Prakrit）

。至於「犍陀羅語」（*Gāndhāri*）的名字，是貝萊提議的，後為布洛所採用。貝萊在一九四六年指出，這種語言在中亞佛教史上十分重要⁽¹²⁾。許多在和闐文、阿耆尼文、龜茲文，及其他中亞語文中的印度詞語，都是從犍陀羅語導出的。這種語言亦用於沙巴加里（*Shabbazgari*），和孟些赫拉（*Mansehra*）等地以驢唇體（*Kharoṣṭhi*）寫成的阿育王碑文、及後世的驢唇體碑文⁽¹³⁾，還有由 A · M · 僕耶（A. M. Boyer）、辛納、諾比爾等所分別校訂的尼雅（*Niya*）文書（Oxford, 1920, 1927, 1929。譯者按：尼雅位於塔里木盆地尼雅河邊，二十世紀初年英人斯坦因會於此發掘出大量的佛教文物）。這種語言的典型特色，就是三個印度齒擦音（*Sibilants*）全部保存，還有某些在其他俗語中已被同化的輔音群，如 tr, br，亦保存下來。

法藏部（*Dharmaguptakas*）長阿含經（*Dirghāgama*）裏的印度字眼的漢語音譯，是基於某種俗語方言的；這種俗語方言，據貝萊和布洛的見解，認為一定是犍陀羅語。無疑，此外一定還有一些漢譯經典是從犍陀羅文譯過來的。但祇有通過細心研究，纔有可能發現在漢譯經典之中，何者是根據犍陀羅文原本。

要決定「犍陀羅法句經」的部屬是不可能的。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在西北印的驢唇體碑文中，是經常提到的一個派別。根據華德舒密脫及其他德國學者所出版的中亞抄本，很清楚顯示說一切有部曾經在中亞一帶流布。但布洛證明：犍陀羅法句經與保存在「法集頌」（*Udānavarga*）裏的說一切有部的傳統是不同的。布洛提到法藏部與飲光部（*Kāyāpiyas*）的可能性，這兩派在西北印的碑文中亦有提及。布洛的校訂本，正文之後，是詳盡的註釋（pp. 177–282）；在這裏，他小心翼翼地比較了「犍陀羅法句經」的偈文與其他傳本的不同。他的註釋，對於研究梵文、巴利文、和犍陀羅文傳本的法句經，在語言、文法方面，有著基本的重要性。布洛的著述，可以說是這一題材上的決定版而無疑。將來即使有新資料發現或再作進一步的研究，他這一著述的主要部份，恐怕仍不會引起實質的改變。傑出的中古印度語專家 K · R · 諾曼（K. R. Norman），曾經徹底研究過布洛的著述

，最近表示…祇有極少的地方可以提出修改^⑯。

(12) Gāndhārī, BSOAS, II, 1946, pp. 764 - 797.

(13)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ume II, part I: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Ed. Sten Konow, Calcutta, 1929.

(14) Notes on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Indian Linguistics, 32, 1971, pp. 213 - 220.

中亞本組出版與華德斯密脫的工作

最近三十年來，德國吐魯蕃探險隊帶回來的梵文抄本的出版有極大的進步。其中，大部份的小乘斷簡都是屬於說一切有部的。關於這一點，通過毘奈耶斷簡，和一份阿毘達磨斷簡——此即

史塔克·羅先 (Stache-Rosen) 出版的「集異門足論」(Saṅgītiparyāya)——與漢譯傳本比較之後，已經得到證明^⑮。這一斷

簡，是雅堅 (Hackin) 於一九三〇年在巴米安 (Bamiyan) 發現的^⑯。另一份由伯希和從庫車 (Kucha·鶻龜茲) 帶回來的斷簡，經戴密微確辨之後，斷明為「阿毘達磨發智論」(Abhidharaṇajñā-naprasthānāśatra)^⑰。但是，有關經類 (Sūtras) 斷簡。

要確定它們屬於說一切有部，便有相當困難，因為各部的經藏都沒有完整漢譯。而且，在現存漢譯經典之中，要決定它們原屬於那一部，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⑱。流行在中亞的一組佛經，它們就是「十上經

難解出世之謎

廣嚴省雄

謝端卿者，江西饒州名士也。字覺老，幼秉庭訓習儒，其人

睿智，經史過目不忘。嘗精研釋道，雖未登第，才名遠播於儒林，宋，熙寧初年，奉親命赴京應試，不期宿緣牽引，在京與蘇軾邂逅相見，如磁吸鐵。傾談之下，相見恨晚，從此詩酒流連，遂

成莫逆。

其年時適乾旱，皇上欲求甘霖，神宗特命蘇軾主理，安排於相國寺。建壇設齋，準備御駕親臨祈雨，謝端卿久想一觀聖顏，却好時機來臨。乃商諸東坡偕同入寺，東坡笑曰：「此事何難，

」(Das Dāśottarasūtra)，「叢集經」(Saṅgītisūtra)，「因緣經」(Catuspariṣatsūtra)，「大本經」(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和「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第六種則可謂是「增一經」(Ekottarasūtra)。據戴密微在他的「佛藏今傳說」(Die Überlieferung vom Lebendende des Buddha, Göttingen, 1944-1949)一書中，他經分析「大般涅槃經」及各類對應文獻，又校訛了此經的梵本，並列印宋文、藏文、和漢文對照 (Das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Berlin, 1950 - 1951)。以同樣方式，華德斯密脫再分析及校訛「大本經」——這是一本記述喬答摩之前的過長七佛，特別是毗婆尸佛 (Vipasyin) 的經典 (Das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Berlin, 1953 - 1956)。

(未完待續)

(15) Valentina Stache-Rosen, Dogmatische Begriffsreihen im älteren Buddhismus, II. Das Saṅgītisūtra und sein Kommentar Saṅgītiparyāya, Berlin, 1968.

(16) Sylvain Lévi, Sur des manuscrits sanscrits provenant de Bamiyan (Afghanistan), et de Gilgit (Cachemire), JA, 1932, I, pp. 2 et 9 - 13.

(17) Un fragment sanskrit de l'Abhidharma des Sarvāstivādin, JA, 1961, pp. 461 - 475.

(18) 參看 J. W. de Jong, Les Sūtrapitaka des Sarvāstivādin et des Mūlasarvāstivādin, Mélanges d'indianism à la Mémoire de Louis Ronou, Paris, 1968, pp. 395 - 402.